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七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华書局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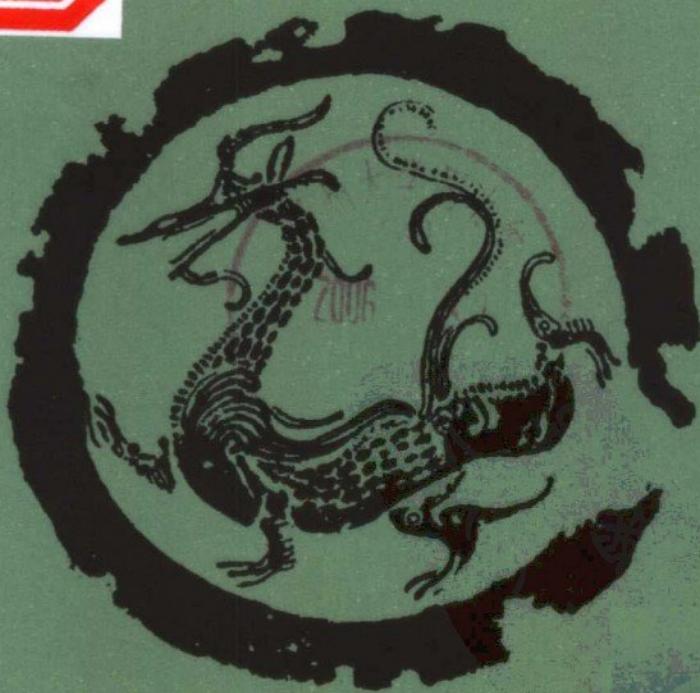
汉学研究

第七集

CHINESE STUDIES

K207.8
Y085

阎纯德 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研究 第七集/阎纯德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ISBN 7 - 101 - 04040 - 3

I . 汉… II . 阎… III . 汉学—文集

IV . K20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946 号

书 名 汉学研究(第七集)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政编码 100073)

印 刷 北京空研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23.18 字数: 61 万

印 数 1000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040 - 4/K. 1670

定 价 40 元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问

任继愈(<i>Ren Jiyu</i>)	张岱年(<i>Zhang Dainian</i>)
季羨林(<i>Ji Xianlin</i>)	汤一介(<i>Tang Yijie</i>)
李学勤(<i>Li Xueqin</i>)	曲德林(<i>Qu Delin</i>)
安平秋(<i>An Pingqiu</i>)	李向玉(<i>Li Xiangyu</i>)

主编

阎纯德(*Yan Chunde*)

编委

王 宁(<i>Wang Ning</i>)	乐黛云(<i>Yue Daiyun</i>)
李明滨(<i>Li Mingbin</i>)	严绍璗(<i>Yan Shaodang</i>)
张西平(<i>Zhang Xiping</i>)	杨翠微(<i>Yang Cuiwei</i>)
周发祥(<i>Zhou Faxiang</i>)	赵永新(<i>Zhao Yongxin</i>)
侯 健(<i>Hou Jian</i>)	耿 昇(<i>Geng Sheng</i>)
柴剑虹(<i>Chai Jianhong</i>)	钱林森(<i>Qian Lisen</i>)
韩经太(<i>Han Jingtai</i>)	

常务编委

宋柏年(*Song Bonian*)

阎纯德(*Yan Chunde*)

卷前絮语

这一卷《汉学研究》是在两场世界性的战争中编辑完成的。一场是伊拉克战争，一场是没有硝烟的抗击 SARS 的战争。因此，这册前沿性的纯学术的书稿便蒙受了些许战争弥散的焦急、困惑和不安。

《汉学研究》是国内第一套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 SINOLOGY(汉学)系列丛书。从 1996 年出版第一集起，至今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算上这一集，总共出版七卷，其间有一年因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着落而少出一集，开创了“流产”的先例，铸成遗憾。本书系每一集的出版都像婴儿降生，非得经历一番痛苦不可。其实，没有苦，哪有甜？这是人世间一般事物的逻辑。当我们看到顺产的婴儿，并听到他仿古的优美啼声时，苦便被幸福消解，一切变成了欢乐。这欢乐当然没有轰轰烈烈，只是小户人家的小欢乐而已。这欢乐虽小，但其感觉是作者、编者、读者共同拥有的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情结。

只要翻阅一下目录，就会知道这一集有着丰富、广泛的内容，既有厚重的汉学理论及汉学史上重大事件的论述，又有具体而扎实的汉学本体的细腻探究。

《汉学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天空。它的建造者孤独而寂寞，是一群文化黑洞里的采矿者。但是，在岁月的隧道里可以感受掘进的愉快和发现的幸福，以及考古学家所拥有的那种在历史土层里发现“文物”和“思想”所获得的无穷诗意。当然，《汉学研究》不是“古玩”，它是一个科学世界，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昨天，还可以认识今天，它把我们与世界与历史的距离拉近了。

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汉学书系编委会

2003 年 5 月 4 日

21世纪汉学瞻望

任继愈

20世纪,是世界各族人民文化大交流的时代;21世纪,交流的大潮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创新局面。世界各国大学开设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如雨后春笋丛生崛起。汉学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显学。

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由于地缘关系,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民族的人口有多有少,国家有大有小,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政治的多元化。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这总归是事实。这个多文化的世界交流中,只要善于利用别人的优长,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各方就会从中收益。

学术研究,与经济交流不同,在近期看不出显著的效果,但是事实证明它的影响和效果是将远远超出学术研究范围,甚至发生当时意想不到的效果。做得好,将造福于后代,做得不好,也将造成不可补救的遗憾。

文化现象研究,是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社会的总钥匙。因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特色反映了民族的特色。一切文化都有两个层面,一是生活文化,二是观念文化。生活文化,包括饮食、服饰、住房及音乐、舞蹈等表象方面的表现层现象。生活文化是每一民族都具备的。至于观念文化,只有拥有完善的文字,先进的科学,有相当发达的民族才具备的,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旅游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容易发现这地区的文化差别。至于观念文化,它处在思想的深层,它是一个民族抽象思维能力高度发达的精神

产品。观念文化的出现,至少要有完备的文字,一定发达的科学,有丰富的文学、哲学精神产品。可见,观念文化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备的,它是一个民族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大体说来,观念文化形成于文化发达的地区,如欧洲的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我们现在只说中国。中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贯穿古今的文明大国,它又古老又年轻,世界几个少数的文明古国,名字中少不了中国,与中国并肩的几个文明古国后来被其他侵略者征服变成殖民地,他们的古老文化被迫中断了,只有中国,几千年连绵不断,持续发展了五千年之久,不但未衰败,更焕发出无限生机。

中华民族生活栖息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以此两大流域为基础,它的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直到今天,仍生气蓬勃地走着自己的路。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当前汉学研究的切入点。今天的中国是从古代中国演变过来的,研究汉学,必须从中国的生活文化入手,这是第一步。生活文化,衣食住行,这些表层文化容易看到,也容易理解。但是观念文化方面却是另一回事,比如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伦理观、家庭观、宗教观诸多方面,以及世界普遍关注的对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中国人与西方社会认识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如果不经过深入交流,很难做到真正的了解。如何开展有效的沟通,也是我们从事文化交流的汉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品格,大致有以下几种特点和性格:不失个性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建设性;刚柔相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除了这些民族文化的性格,它的民族智慧——思想方法的生生不已的发展观和大不遗细的全局观,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这种卓越的民族文化性格,使它历经磨难,战胜困厄,求得了生存,得到了发展。借助它的智慧,使它遇难不惊,团结 56 个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些特点和优点,当有待于汉学家们深入发掘,使它走出国门,奉献给全世界。

汉学家首先是语文桥梁建筑师,疏通语文交流的桥梁。这方面,

经过我们前辈几代人的努力,创造了今天的显著成绩。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入,自然会进入观念文化领域,接触到中华文化的核心,必然涉及哲学、文学、宗教、史学方面,这是 21 世纪汉学研究,从语言文字到理论思维的必由之路,也是今天汉学界比前一代汉学家显著的不同处。

根据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文化发展历程,来考察我们汉学研究,不无某些可供参考之处。“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界关心“西学”。当时的“西学”的涵义,有似今天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汉学”,涵义相当广泛,也可以说相当含糊。既包括西方(主要是欧洲)的文学、哲学、宗教,也有社会学、政治学,当然也有自然科学。中国学者从但丁、荷马、莎士比亚以及托尔斯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接触到大量的各种流派的著作以后,当时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化的内容由简略趋于详备,由模糊逐渐清晰,由略观大意逐渐深入到学说内容。对“西学”的理解逐渐具体、深刻。当前,“汉学”研究的范围有多大,学术界理解很不一致,这是对不同文化的认识、了解的必由之路。正像当年中国学者对“西学”一样,随着研究的开展,对中国观念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具体,“汉学”研究范围必将会自然解决。无论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学,诸多领域都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切入点。钻研既久,自然会得到明确的共识。到了 21 世纪最近的五十年,汉学研究形势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可以预言,五十年后,世界多元文化观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东西方观念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将出现以客观、平等、科学的态度来认识文化的特点,逐渐发现不同文化的优点。我们将看到不同文化深入交融,做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共同受益,为人类建设共同珍惜文化宝库。它的建设意义将超出学术界研究的小范围,每一文化发达的民族,从中收益,开创世界文化的新生面。这种光明前景应当说并不遥远。因为文化是一民族的生活之树,它扎根于各自民族的社会土壤中。各民族都受它赖以生存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观念文化的制约。

文化的民族性、地区性,还起着相当重要影响,比如霸权主义、强

权政治,难免干扰人们的客观分析。有的民族有高度的文化成就,如果这个民族当时的国力处在贫弱的劣势,它的文化中珍品,就不会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以人废言”,弱势民族的文化随着也处于劣势。有的强势民族,往往把他们弊端百出的文化强加于劣势民族。这种状况,曾经受过殖民统治的民族都有深切的感受。遇到这种情况,既要由文化本身来争取应有的地位,也要借助民族振兴的努力,加速改变其劣势处境。民族处境改善了,它的文化也随着增加了身价,受到应有的尊重。

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来可以用几千年积累的大批量优秀成果贡献给全人类,从而丰富人类文化宝库。只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国势不振,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它的优秀文化也受到株连。自从新中国建立后,综合国力强大了,中华文化也随着受到比过去更多的重视。

生活在 21 世纪的每一个民族,都要珍视这个机会,认真总结各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用以指导前进方向,向全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国家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本书系顾问)



汉学，本土文化的一翼

严绍璗

阎纯德教授主编的《汉学研究》第七集已经编辑就绪，即将公刊。我有幸作为本卷文稿未刊时的早期读者，深得其益。自1996年阎纯德教授主编《汉学研究》第一卷公刊以来，风雨无阻，每年一卷，从而使我国人文学者在“Sinology”研究领域中的业绩有了一个向世人展示的阵地，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对于国际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层面所进行的“Sinology”作出的积极的回应。

“Sinology”在国际学术界是一门时代跨度悠远，学术含量丰厚，意识形态复杂的综合性学科。这一学术在世界各国的发生与发展，显示出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和它的影响的深刻性。“Sinology”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则是中华的人文学术，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实际上，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Sinology”的学术成果，大多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但是，任何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他所表述的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以及他的研究的方法论，都受制于他的“母体文化”；而他的“母体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接触的层面，便是造就他们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区域。他们正是以他们的文化作为理解世界的背景而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事实上，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Sinology”所表达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说，即是他们的“本土文化”观念。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Sinology”的学术成果，其实也是他们“本土文化”研究的一翼。从文化研究所体现的本质意义上说，国际范围内的“Sinology”，皆可以看成是属于从事这一研究的各对象国

的文化系统中的学术。综合而言,我想可以说,这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

对我们中国学术界来说,对国际范围内的“Sinology”的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

《汉学研究》便是以这样愈益深化的观念和愈益深入的研究,年复一年地积蓄着研究的成果,描摹出我国学术界在这一学科中推进发展的轨迹,并推动着新的研究的发展。

通观本卷的内容,我感到至少在这一学术的四个领域中得到不少的教益。第一,在这一学术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组成的宽阔的时空中,加深了对欧洲“Sinology”具体的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的理解;第二,对于在历史的进程中,欧洲和东亚的有关学者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以他们认知的中国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国观”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第三,对于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获得了新的知识;第四,对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得到了新的启示。上述四个层面,我以为这正是我国人文学术界将“Sinology”从零星的断片的见闻报道提升为具有“学科”水平的“学术研究”的最主要的标志。这样的标志性研究集中在阎纯德教授主编的《汉学研究》中,这既是我国人文学术界各位同行共同努力的成果,更是阎纯德教授七八年来苦心孤诣专志于这一学术的成果。

纯德教授与我四十余年前共同受业于北大。他1958年入学,我1959年入学。我们居住于一楼长达四年(当时的北大,人文学科为五年制),也常常共聚一堂聆听赫赫名师的教诲。他早我一年毕业,做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出国教学的汉语师资,“文革”后到法国教学,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波尔多第三大学执教

七年有余,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留意于欧洲的“Sinology”。我毕业后却未能走出北大的校门,校方叫我留在学校摸清点作为美国侵华遗产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各种资料,不竟成为我以后进入的“Sinology”研究的起始。我在学历年辈上晚纯德一年,学识上更是晚进多时。现在当纯德教授编纂《汉学研究》第七卷即将完成之际,嘱我为本卷做一篇序文,令我惊诧汗颜,实不敢当。但是,我作为纯德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Sinology”的研究的见证人和同路者,对他为在我国人文学术界建立“Sinology”这一学科所做的不懈的努力,和他在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上所获得的业绩,感佩于心。《汉学研究》是纯德教授独立创办的、现今已在学界具有影响的刊物。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他既要讲课做研究,又要为刊物策划、构思、组稿,并承担与作者联络、集稿、编辑等等。诸事烦劳困顿,而他始终生气蓬勃,历数年而不易其志。我常常想,是什么激发了他生命的能量?除了“学术”,除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赢得学术,别无分毫之利可得,使我深深地感动——尤其在今日的社会中,让我有挥之不去的激情。于是,我深感自己有责任向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在这一领域中从事研究的比我们年轻一些的朋友们,略略地讲述这一学科研究起步的经纬,理解像纯德教授这样一些早期的先行者们的追求和努力,以及为此而肩挑重担的分量。这或许有助于为真实地描述我国国际“Sinology”的研究史提供一些真实的材料,也更加有助于比我们更年轻一些的研究者能够理解他们所进行的本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是在前辈学者无穷的实践所构筑的舞台上进行的,从而对于目前盛行于人文学术界中的没有任何历史前提的胡乱的自我张扬,对于学术界现在愈来愈盛行的“要做学问就拿钱来”的定势思维(现在动辄敢向国家纳税人的血汗索要上百万、上千万、上亿元的文人已经愈来愈多了),提示一些敬畏的心态和谨慎的作风。读者诸君如果能够从本卷中获得关于国际“Sinology”的有益的和有趣的知识,并因此而引发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认知的思考,进而能够推进本学术的进展,我想这便是对本卷各篇作者与本卷主编的最好的慰藉了。

2003年仲夏于北京大学跬步斋

目 录

序一：21世纪汉学瞻望	任继愈(I)
序二：汉学，本土文化的一翼	严绍璗(V)
从“传统”到“现代”，历史变迁中的汉学形态	阎纯德(1)
20世纪日本中国学的启示	严绍璗(23)
西方哲人与儒家思想	钱林森(37)
后现代语境下的汉学和翻译	张宝钧(54)
明末清初西洋术语译介引发的论争	
——以“天主、上帝”为例	冯天瑜(61)
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熊文华(71)
论澳门与礼仪之争	吴志良(87)
艾田蒲看“中国礼仪之争”	叶 潘(107)
拜耶尔与俄国早期汉学	阎国栋(129)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记俄罗斯汉学家米亚斯尼科夫院士	
..... [俄国]齐赫文斯基著 陈开科译(141)	
俄国汉籍收藏家斯卡奇科夫	阎国栋(157)
18世纪俄国来华留学生及其汉学研究	肖玉秋(172)
中国与欧洲国家观念的比较	[法国]谢和耐著 耿 犀译(185)
浅析黑格尔的中文观念	班立华(198)
汤若望与明清变迁	
..... [美国] John W. Witek, S.J.著 余三乐 丁伯成译(215)	
文武之道——中国文化中的男性建构	
..... [澳大利亚]雷金庆 李木兰著 宋 耕译(231)	
17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 [法国]谢和耐著 耿 犀译(248)	
略论天主教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策略	余三乐(258)
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第一任团长孟三德神父	崔维孝(278)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筚路蓝缕至辉煌	叶 潇	(304)
关于传教士调停黔西南回族反抗军与清政府关系的认识		
.....	秦和平	(321)
从小岛祐马的思想基础看京都 Sinology 的特点	刘岳兵	(334)
田中庆太郎与文求堂	钱婉约	(358)
捷克共和国汉学研究的基石——访捷克科学院		
东方研究所	孟 国 刘学敏	(364)
中国文学翻译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		
..... [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著	王巍译	(374)
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		
——兼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	张西平	(397)
西方近代以来汉语研究的成就	张西平	(423)
法国汉语教学发展史概览	许光华	(443)
晚清香港教会教育研究	夏 泉	(471)
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正名 [美国]王靖献著	张卫晴译	(490)
世纪汉学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张 泉	(498)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评者和读者		
——欧美汉学研究综述	周发祥	(537)
梅耶尔的罗隐研究	陈才智	(555)
西方的中国游记散文研究	陈才智	(563)
《小说家老舍》引言 [法国]保尔·巴迪著	吴永祥译	(590)
论《骆驼祥子》 [法国]保尔·巴迪著	吴永祥译	(612)
法国诗歌和远东之关系 [法国]克罗岱尔著	张 彤译	(628)
中国人的迷信 [法国]克罗岱尔著	马利红译	(639)
《西游记》在日本	蒋春红	(647)
敦煌愿文与《日本挽歌》	王晓平	(659)
奸夫盗银故事在日本的衍生	王晓平	(670)
“甥舅共盗”故事在朝鲜李朝的变异	王晓平	(684)
朝鲜语的汉字词与汉字文化的关系		
..... 李 灶 [日本]李贞爱	(693)	
朝鲜假面剧与汉文化因素	李 灶 [日本]李贞爱	(704)
严嘉乐:沟通中捷文化交流的“夜莺”		
——读《中国来信》	余三乐	(709)
高山流水知音在——读《1907 年中国纪行》	岳 巍	(723)

从“传统”到“现代”，历史变迁 中的汉学形态

阎纯德

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西方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从以法国为代表的“Sinology”（汉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Chinese studies”（中国学），这个变迁是东西方历史变化的结果。历史语境对人的思想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汉学，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新型文化，同样受着历史变化的深刻影响。这里所说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当时的历史变化。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在世界汉学发展史上，就基本形态而言，成熟的汉学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现代汉学则兴盛于美国，而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相对地繁荣起来。尤其在 20 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以及后殖民理论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汉学的解构，这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汉学的形态及其理论的发展。

—

汉学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不过它的真正建立，应当归功于大批

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基督教(时称景教,为基督教的一个派系)进入中国远在唐朝,但后因唐武宗在 841 年至 846 年间奉行“崇道灭佛”所殃及而失传。真正对中国文化起作用的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大批耶稣会士入华,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使中国文化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汉学便真正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俄罗斯等主要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一种越来越显赫的关于东方文化的学术“流派”。在日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方文明仗科技、工业、商业优势大举东进,以宗教怀柔炮火相加,在“交流”伴随掠夺中开始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

汉学兴盛发达的几百年,是西方知识者认识、研究、理解、接受东方文明的几百年。西方人终于看到东方的精神,发现了以儒释道为根基的中国文明。于是,汉学从盲目到自觉,从政治到学术,在东西方长期不和与“磨合”的历史过程中,从不正常的途中,终于达到正常的目的地。在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上,汉学的现代性表现为弱肉强食般的掠夺,汉学的成功积累是以中国人民的屈辱和痛苦为代价的。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有案可查或无案可考的中国文化典籍和文物的惨痛被盗和“流失”是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的“奇观”,它们至今或堂而皇之地陈列或不见天日地躺在异国的文化场所或私人之家的收藏室。到了 20 世纪,由于世界两大政治集团的尖锐对立,“汉学”曾经成为政治的一个部分。

汉学是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结果。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接触远在公元之前。但那时的人类还处在无法克服山水阻隔和路途遥远的时代。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Joh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对彩陶的研究,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以北地区便已与俄国南部的 Tripolje 地区及多瑙河流域有了文化来往。希腊人在公元前 5 世纪,便知里海 (Caspian) 周围之陆地,并记述了天山南麓和北麓居民的情况,还以地中海、黑海为界,最早把世界分为欧罗巴 (Europe) 和亚细亚 (Asia)。希腊人克泰夏斯 (Ktesias) 在公元前 4 世纪就对中国人有所记述。亚历山大远征,虽然有地理学家和科学家随行记录地理资料和民情,但对中国和东方,所知仍然甚少。但到了罗马时代,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罗马时代的文献里开始出现中国地理、物产、居民的记载。纪元前后,当时称

中国人为赛里斯(Seris),称中国为赛里加(Seric);另一种叫法,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 Thinai),称中国为秦(Sin, Thin)。西方人的这种称呼,均源于秦始皇时期。“随罗马之勃兴,希腊文化光被之诸地方,统一于罗马政权下,希腊罗马文化扩大于西欧”,结果才出现了“东方”(Orient)这一概念,并成为欧罗巴世界之外的特殊世界^①。在此意义上的东方,始见于罗马时代著述家的笔下;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小百科全书》及《世界历史大事表》上,人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公元170年,罗马帝国时,马克·奥尔雷(Mark Aurle)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大概是东西方最早、最明确的交往的一个记录。

从以上西方历史文献的记载看,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在这两千余年中,汉学在其孕育、形成、成长、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萌芽期”或是准备期。纪元前后,人类处于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这个寻找和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十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欧亚非的千余年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友好交往开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汉学的萌芽虽然可以从纪元前后说起,但是这种由于中国文化与异国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汉学”,还远属于一种无意识或不自觉的阶段。公元522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个时代开始,大量中国文化典籍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正在创建自己文化的一种借鉴,并没有形成日本文化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代开放的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西方和中国的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进入中国腹地,当时的长安成为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人这座都市,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较多的认识。但是,从文化深处著书立说阐释中国文化的,应该说还没有出现。